

贺 联 集 锦

治国宏论寓全球彪炳千古；
璀璨明珠归神州传颂万年。

（刘 铎）

心连中华仰观北斗星辰近；
情系香港俯视南海翡翠流。

（王克仁）

伟人设二制；
香港炳千秋。

（李法宗）

行“二制”彩云归喜报碧海；注
迎“十五”明月朗光辉神州。

驱列强兴中华拯救民族浴日洗天开先河百业沐雨俱换颜人民感
恩毛泽东一朝风流千朝颂；

倡改革设二制富强国家完璧归赵出奇谋万物逢春皆得意百姓歌
功邓小平盖世英明举世传。

（张大发）

注：小平魂归大海，故曰。

口 占 一 绝

刘 铎

在庆祝香港回归座谈会上即兴

百年奇耻主权衰， 今日香港神州归。
伟人构想设工制， 一统江山尽朝晖。

七 绝 二 首

李振宗

一

宽怀两制展宏图，
挥手一言胜万夫。
不用兵戎复国土，
英凶末路无前途。

二

香港回归祖国时，
心情舒畅喜吟诗。
扬眉吐气幅员整，
谈笑风生设计师。

绝 句

李法宗

香港中原亘古同， 政辖秦汉早通融。
一朝“三约”成奇耻， 赤县延年愤不公。

桂 枝 香

张大发

1997年4月21日，距离我国对香港正式恢复行使主权还有71天。“七一”是建党节，又是回归之日，可谓双庆。余观《香港百年》有感，欣然命笔。

神州赤县，恰霞明光艳，物华烂漫；长城劲舞东风，雄姿千万；大江欣然起狂涛，九万里、春融霄汉。更竞征帆，快马着鞭，画亦足难。⁽¹⁾ 忆清廷、官腐政乱，招敌寇蹙入，国民劫难。华夏奇耻，何时雪？愁肠断。难待伟人定韬略，经纶手扭乾坤转，⁽²⁾待到“双庆”，十亿醉歌，黄龙欢宴。

注：(1)画亦足难：画虽美，也难画出此时情景。语出王安石《桂枝香》“画图难足”。

(2)经纶手：治国能手。辛弃疾《水龙吟》：“几人真是经纶手”反其意而用之。

浪 淘 沙

李振宗

奉命禁英烟，谁问摘贤？忠良今古几安全。昏聩君臣怯再战，和议连连。专制帝王权，指扁不圆。殃民误国负尤愆。在上头儿偏有礼，谁敌说偏。

知白守黑觅乡魂

张大发

感情，一个多么富有诗意、多么牵肠挂肚的字眼！我因此也常常受到困扰，有时甚至陷于感情的旋窝不能自拔。比如我要讲述的故事，我要追寻的乡魂，不也是这牵肠挂肚的感情所驱吗？其实，人类社会也是在感情的冲撞中发展进化的。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在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感情又一次发生冲撞，而且总是感到温度不高，热量过少，激情太低，于是什么都要轰轰烈烈，滚滚汤汤，似乎越激烈越高潮越炽热越灼人越好。于是诸如大跃进、高指标、大计划、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热度极高的口号和行动便应运而生。然而物极必反，客观规律总是不容违背的，否则会阴差阳错地导致各种悲剧。在这方面，通渭似乎更突出更典型更沉痛。

话从截处来。

“1958年，全县人均口粮不足百斤，冬季部分地区群众生活已相当困难，只得以野菜、草根、禾衣、树皮充饥。碧玉、义岗、第三铺公社开始出现人口浮肿和死亡现象。”

这是引自官方的资料，证明了客观形势也如到了严冬一样，酷寒酷寒，令人战栗，——灾荒是确实的。不过资料记载的时间和现象很不统一，想必冬季，在这千山枯岭，在大地封冻的情况下，是无法寻找野菜和草根的。事实上，灾荒是1958年春季就开始的。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某些领导人的思想还在继续升温，他们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全县农业实行大计划、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政策，上逼下吹，弄虚作假，方兴未艾，十分惊人。1959年春夏之交，问题愈加严重。7月又连降暴雨，大面积粮田受灾，不少民房被冲毁，天灾人祸使困难急剧加深，人口大量外流，死人已成普遍现象，困难已成灾难。但当时有些领导还不承认事实，反视为“阶级敌人在粮食上捣鬼”。于是，“千人整社团”排山倒海般涌向农村，立时，千人、万人斗争大会如山洪一样倾泻到广大干部群众身上，这还不算，整社团又挨门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掘地挖墙，搜查粮食，终于使灾祸恶化到了最严重的地步。1959年腊月，通渭这块土地上，竟然饿殍满地，活着的也是奄奄一息，人们的感情经过剧烈冲撞和饥饿的严惩，无限度地冷漠，以致骨肉相残时，也不悲

伤，也没有眼泪。

然而，绝无仅有。就在这时，一位在外地上学的通渭学生，寒假回家，目睹家乡发生的饥荒，百姓残不忍睹的现象，于心不忍，萌生出一个为常人所不敢想的念头：向上级反映。

他返回了学校，那是我国北方某农业院校。这一夜，他展转翻侧，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得很多，这被传统地、世俗地认为是告状的事，而且越几级状告中央，又是非常时期，后果将是怎样的呢？然而，几十万家乡人民倍受饥饿，危在旦夕，又怎么能置之不理呢？那无数双饥饿的手仿佛拼命撕扯着他的心。在痛苦万状之际，他终于铁下了心：告状就告状，为了家乡人民，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他索性什么也不想了，只想着向党中央告状。

翌日黎明，他出发了。

那是1959的腊月将尽的一天。一列从北方某城市开出的直达列车，穿山越岭，风驰电掣般直向首都北京奔去。靠窗坐着一位血性方刚的青年，他不时凝望窗外，雪后初晴，红日东升，皑皑白雪清晰地勾勒出祖国北方山河逶迤起伏的俊貌，当列车驶入华北平原

时，那一望无际，坦荡如砥的平原风光，犹如一幅壮美的画图展现在他眼前。他还是第一次领略这美丽的平原风光，心情应该十分激动而舒畅，可他那张俊秀刚毅的脸此刻凝重得象一块水泥板，两道粗黑的大眉拧得紧紧的，几乎随时都有可能拧断似的，窗外呼啸而过的凛冽寒风无论如何荡不去他脸上重重的焦虑，倒使他本来干裂的口唇浸出点点血丝。他无心继续观望窗外景色，回头呷了一口早已冰凉的开水，立刻陷入沉思：到北京后一切都会顺利吗？找谁去反映问题呢？中央机关，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会引见自己吗？……困难重重，谈何容易！但他坚信自己要做的事光明磊落，坚信中央首长会议接受他的来访的，尤其当他想到几十万在饥饿中挣扎的家乡人民时，他全身发颤，拳头攥得咯咯响：“困难怕什么，即使登天也要试一试。”他自言自语道。

列车开进了北京车站。随着轻轻一荡，列车停住了。他单身只提个小包，很快挤下车。北京，多么神往的地方，那幢幢雄伟壮观的高楼大厦，那条条宽阔繁华的街道，座座辉煌古老的建筑群，即使一草一木都会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但他顾不得去观赏，也

不顾整夜旅途生活的疲劳，边走边打听，直奔国务院办公厅。若是不成，再找中央办公厅，无论如何也要把问题反映上去，他想。可是，情况出乎意料的顺利。当他来到国务院办公厅接待室，向工作人员谈明情况后，工作人员十分热亲，无不向他投来钦佩的目光，二话不说，立即带他来到办公厅，办了个简单手续之后，转由一位四十开外的女同志带领，沿着一条翠柏簇拥的古朴甬道来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办公室。

“谭总理，这是一位甘肃同志，他有重要情况要向您反映。”女同志介绍道。

“好的好的，请坐。”谭总理从椅子上站起来，亲切招呼他坐下，又亲自为他倒水沏茶，递烟。他没有吸烟的习惯，只捧住了茶杯，就在这时，他感到一股暖流立刻通融全身，定睛端详这位举止壮重，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总理，呼呼的心跳顿时缓和下来，一身疑虚和胆怯顿释，几句寒暄之后便插入正题。两年的大学生活给了他丰富的口头语言和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但他深知，此时此刻，只要能把问题谈清楚，既不夸大又不掩饰就行了。谭总理听得十分认真，还

未谈及一半，谭总理的情绪已经显得非常激动起来，他觉得年轻人谈的问题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又是那样的令人坚信不疑，从他急剧变化的脸部表情看，他负疚，他痛苦，啊，人民的副总理，人民饥饿羸顿，捕鼠罗雀，背井离乡，抛尸荒野，他能不心疼似绞吗！当他听完年轻人最后一句话，不禁潸然泪下，副总理也被卷进了感情的旋窝。

“你去过甘肃省委吗？”谭总理用颤抖的声音问道。

“没有，”年轻人站起来回答道，“我是直接从学校来的。”

“那么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来北京之前，我回了一次家，村里人已经死过半，我父母的尸体还在炕上，没人掩埋，我也顾及不了他们，当夜返回学校……”

“哦——”谭总理拭去腮边眼泪，“这样吧，我写封信，你马上去找甘肃省委，情况会有变化的。”

“谢谢总理，谢谢……”年轻人终于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泣不成声地说，“我……马上……去。”

告别了谭总理，他无法估计他怀里揣着的那封信

的份量，也不知道自己的心情是沉重还是轻快。从蒙古高原吹来的寒风带着粒粒沙尘扑面而来，但北京毕竟太美丽了，虽是寒冬，仍充满无限生机。从他懂事开始，十几年连做梦也向往着北京，而现在他居然扑进了她的怀抱，该是何等的骄傲自豪，可是——人生不知有多少令人烦恼的“可是”——他心急如焚，无暇尽情地瞻仰她的宏姿，领略其美丽风光，立刻挤上汽车向北京车站奔去。当汽车经过天安门时，他爬向窗口，深深地向巍峨辉煌的天安门城楼鞠了一躬，仅此一躬，汽车便开过去了，他甚至连天安门是个啥样子也没有看清，遗憾，啊，天大的遗憾！但他没有这样想，此时，他的心完全系于那封信上，除此，什么也没有。汽车开到了北京站，他立刻跳下车，一头钻进了购票大厅……

几个小时后，一列载着两千多乘客，也载着一颗急如火燎的心，载着一个有关十多万人性命的使命驶出古城北京，飞驰南下，继而沿陇海线西行。尽管车速飞快，但他仍觉太慢。夜深了，外面很静，车轮与路轨轰轰隆隆的撞击声如一串串接连不断的闷雷，从他心上滚过去又滚过来。他感到压抑、愤懑、痛苦、

忧心，实在太困倦了，他倚着座靠，耷拉着头，想睡一会，但谈何容易！他盘估着到甘肃省委后的情形。他知道省委书记叫张仲良，直接找他，可书记会不会接见他，或者书记牙根不在机关，那么，再去找谁呢？一切都象在北京一样该多好啊！该考虑的他都考虑了，总之，无论如何也得把谭总理的信送到他们手中，无论如何要请求省委立即解决通渭问题。他愈想愈清醒，愈想愈急切，恨不得跳出窗口，插翅飞向甘肃省委，他站起来想走走，可是两腿象注满了铅，沉重得一步也挪不动，他只好又坐下去。不知又过了多少时间，他终于在极度疲惫中歪着脖子，在座位上睡着了。

突然，列车强烈地震动了一下，他醒了，揉了揉惺松的眼睛，看见车箱里乱哄哄的，原来列车已驶进了兰州站。片刻，他挤出车，径直向省委奔去。时近春节，但兰州仍觉几分萧条，市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抢购食物的情景随处可见，有时他难免从队伍中挤过去，立刻会招来一片喝斥，但他不顾这些，照挤不误。经打听他来到宁卧庄那四层青灰色大楼上。工作人员告诉他，省委领导正在三楼会议室开会。要接见只能在下午两点。“不，这太迟。”他再三恳求，但工作

人员仍坚持不放他进去，他横下一条心，冲开阻拦，直奔三楼会议室，叩响了会议室的大门。不一会，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十分严肃地审视着站在会议室门前的这位高个儿，细条身材，眉目清秀而又风尘仆仆的年轻人，接着问他什么事，他简短地回答了中年人，中年人显得不屑一顾，迟钝地摆了摆胖手说声“会后再来”便转身欲走。

“不行、不行——”他拽住中年人的衣襟，嚷道，“人命关天，我有谭副总理的信，是亲笔的，不信，你瞧。”

他十分激动而又着急，几乎语无伦次，但却管用。中年人回眸一瞧，信封上“国务院”三个清晰的大字立刻跳进他的眼眶，心想，这年轻人怕有几分来头，便答应进去传话。

不一会，出来一位身材魁梧，面容庄重，年过半百的壮年人，几乎用同样的目光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位不速之客，然后说声：“你来”，便朝前走去。年轻人跟在后面来到一间宽敞的办公室。

“什么事？”壮年人的双眉锁得很紧，他似乎正在考虑着一个什么重大问题，还没有坐定，便这样问

道。

“我要找省委张书记反映通渭问题，你是张书记吧？”他一边递上谭副总理的信，一边问道。

壮年人一听“通渭问题”，显得颇为注意，刚才那种考虑问题的凝重神情一下子荡然无存。

“不，我叫王秉祥。”他说。

年轻人迟疑地望着这位叫王秉祥的壮年人，似乎在说：“我要反映的问题很大很大，你能行吗？”

王秉祥看出了年轻人心中的疑虑，边拆信边简短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后说道：“我可以代表省委、省政府，你放心谈好了。”

于是，一个关系到几十万人性命的大事在宁卧庄省委办公大楼第一次被披露出去。王省长听得十分认真，曾几次陷入困惑和悲痛之中。

那还是1959年春，他在天水考察返回兰州时，在通渭城东川发现不少社员在田间地头拔野菜，他停住车就地询问了一下群众生活状况，之后到通渭县委，听取了县委主要领导的汇报，但有关群众生活的问题与他了解到的情况截然不同，他批评了县委在工作和思想上的弄虚作假，但仅仅是批评而已，考虑到当时

政治的和工作的种种因素，也没有向省委汇报这一情况，没想到……

短暂的回忆使王省长越加相信年轻人反映的情况，他攥紧双拳，恨恨地敲着自己的双鬓，听年轻人继续讲下去。……

也许因为问题实在太严酷，或许因为谭副总理的亲笔信份量太重，抑或年轻人的举动不凡，王省长长叹了一口气，脸色十分严峻而凝重，半晌说道：“你谈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我回头马上向张书记汇报，你可以回去了。”

这并非是逐客令，王省长无暇多谈，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年轻人仍迟迟不肯离开座位，他反复琢磨着壮年人的话，并习惯性地作出一个推理公式：“汇报——研究”，或者一次研究不成，再来个第二次、第三次，这期间该要经过多长时间，还是个未知数，可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通渭人民，即使迟一天迟一小时，都会迟出残重的后果啊！想到这里，他排出一切个人杂念，大胆又恳切地说：“王省长，二十多万通渭人民的生命危在旦夕，救人如救火，万万迟不得呀！”

王省长脸上的肌肉猛然抽搐了几下，面对这位年

轻人的恳求，不，更重要的是他所谈的问题，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想到了，在这非常时期，即使作为常务副省长的他，要反映这类问题，也要考虑再三，可年轻人什么也不怕，他自惭不如，决心立即向省委、向书记汇报，争取最快的速度。于是，他严肃而庄重地说：“我现在就去汇报，你反映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迅速妥善解决，你可以放心回去。”

通渭问题就这样被反映到省委。这里需插一句话，当时，王省长没有作记录，时隔三十年，王省长忘了年轻人的名字。只记得这位年轻人说他在陕西某农学院上学。其实，即或有记录也无用，想必在那个年代，又在那种情况下，年轻人是不会吐露其真实姓名和其他一些实情的。可贵的是王省长毕竟没忘记这位可敬的年轻人，他曾督促我们通过一定形式去寻找他，可他究竟是谁呢？

还是言归正传。出了省委办公大楼，年轻人朝着什么方向去了呢？他没有回家，是去学校？还是到更远的地方暂时躲避躲避可能招来的风险？如今谁也不知道，笔者也无法继续跟踪他了。

再说王省长，年轻人走后，他并没有立即向张仲

良书记汇报，而是立即向中央拨电话。30年后的1989年某日，年逾花甲的王秉祥同志看了《通渭县志》后，深有感触，坦率而又负罪般地对县志办公室的同志说：当时，省委的政治生活也很不正常，他负责农村工作，感到压力很大，但能否引起省委主要领导的重视，迅速妥善解决年轻人反映的问题，没有把握。因此先向中央汇报，请求中央指示，同时，在中央备个案，将来好开脱自己。拨完电话后，才向张仲良书记作了汇报，没想到省委很重视，立即召开常委会作出决定：给通渭的统销粮可以提高到人均每日8两，同时扩大统销面，组织工作队迅速到通渭抢救人命，并决定由王秉祥同志带领一些人先行调查情况向省委汇报。

1960年正月初二清晨，几辆小车从省委大门开出来，驶过市区，便风驰电掣般向通渭奔进，下午一时许到达通渭。当时县委和政府领导在榜罗开现场会，只有雷炳焕副县长在家主持工作。王秉祥同志没有听汇报，催促雷炳焕同志带路，立即向年轻人反映的问题最严重的那个村进发。半路上，王秉祥从车窗看见路旁有一老一幼，估计是爷孙俩，都饿得皮包骨头，脸色黄绿。他叫住车，取了两个烤饼每人一个，可老头

将孙子的烤饼夺过去，仅给他很少的一点。看见此情，王秉祥非常生气，但马上又想到，老年人做得对，假若老人不保，这小孩依托谁呢？他还能活吗？再说饥饿过度的人，吃多了也不行。于是他安慰了几句便继续走。……

1990年正月十五日，省方志办的薛方煜同志奉王秉祥同志之命，联合通渭县志办的同志考察当年的情景，并查找反映通渭问题的那个年轻人，经多方了解，当年王秉祥同志去地方正是今寺子乡吊咀村，我们一同前往。

年老的村民至今记忆犹新，下午两点多，村上开来了几辆小轿车停在打麦场上，听说是省上来的大领导。当时村里已死人过半，年轻人反映的问题得到进一步证实。随后省委调运大批粮食，派了大批工作组，抢救工作全面展开。从饥饿的死亡线上走过来的人们可曾知道，正是我们叙述的这位不知名的年轻人为通渭人民、为自己的父老乡亲立下了历史性功劳，也正是他不计个人安危，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我们党、为人民政府解决通渭问题争取了时间，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更大错误，他不愧为党和人民的优秀儿男，然而，他